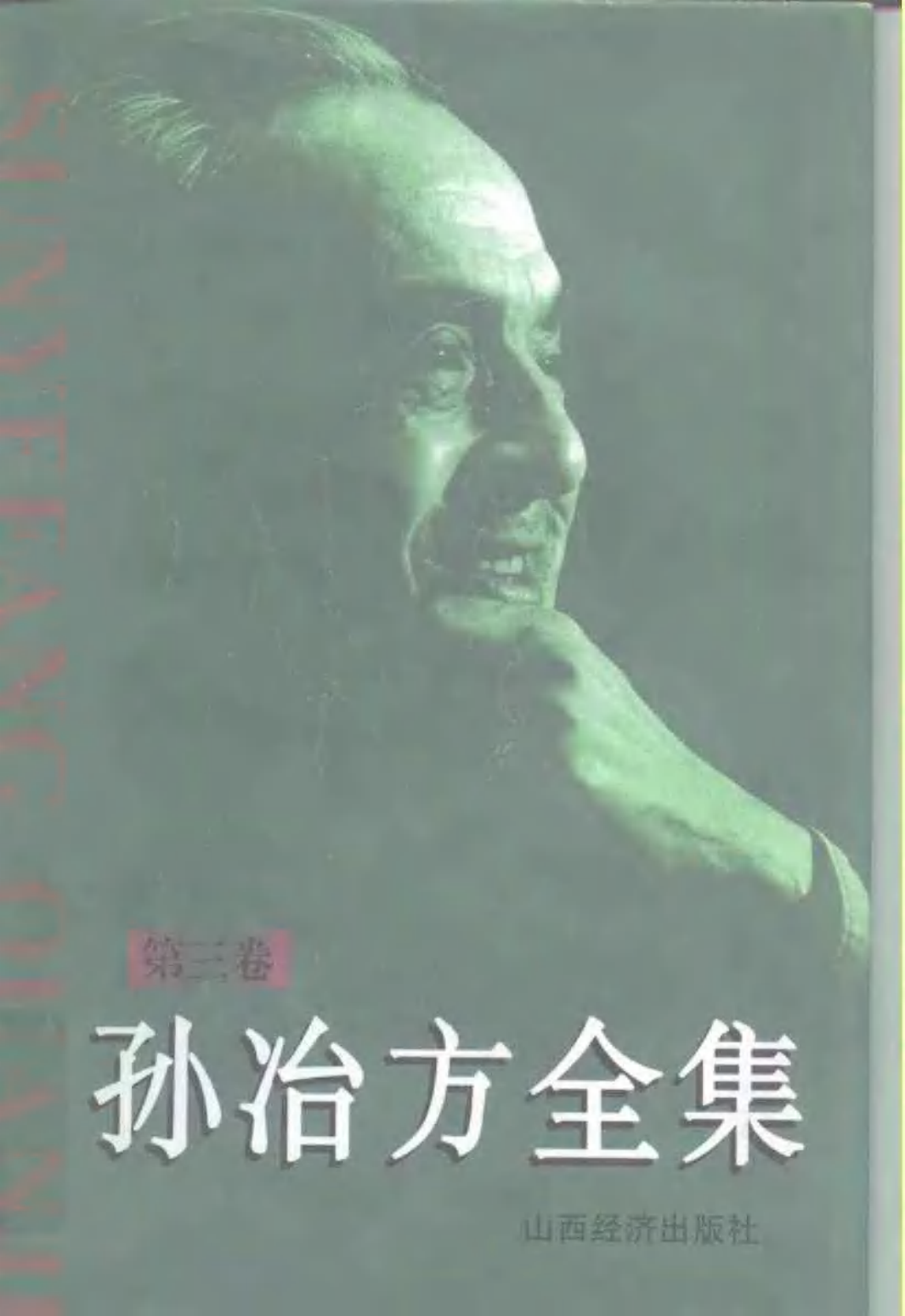




第三卷

孙冶方全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2190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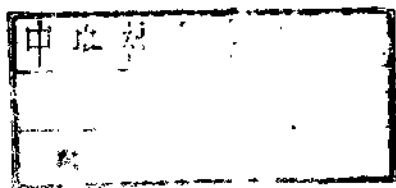
孙冶方全集

1972年~1983年

《孙冶方全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201021900



山西经济出版社



孙治方

目 录

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	(1)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 一个被“四人帮”搞混乱了的政治经济学	
概念	(55)
给钱学森的一封信	(68)
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	(71)
一、何谓利润	(73)
二、评“一定的利润”	(76)
三、概念混乱	(77)
四、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的三条	
界线	(79)
五、关于价格形成的基础问题	(80)
六、农民的负担方式问题	(85)
七、要为“资金利润率”恢复名誉	(87)
八、答复资金利润率的批判者	(91)
九、资金利润率和奖金	(95)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96)
《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前言	(102)
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考察时对几个经济学问题的	

体会·····	(108)
企业管理体制问题·····	(108)
收入或净产值·····	(110)
计划和市场·····	(112)
“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或“按照客观经济规律 办事”·····	(113)
在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上的发言(节录)·····	(116)
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管理问题·····	(125)
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	(147)
生产关系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147)
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为何没有 “所有制形式”这一条·····	(156)
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 制度·····	(170)
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	
——为平心同志《论生产力问题》一书写的序·····	(187)
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	(203)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节制生育同马尔萨斯主义的 根本区别·····	(205)
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节制生育的重大意义·····	(211)
三、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	(217)
怀念周恩来同志和李富春同志·····	(220)
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	(221)
为培育经济理论队伍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222)
在曲折中前进·····	(225)
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	(227)

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几个争论·····	(231)
一、什么是生产力·····	(231)
二、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争论之一 ——生产力三因素论和两因素论的争论·····	(232)
三、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争论之二 ——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关系是 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42)
四、关于生产力定义问题的争论之三 ——生产力有没有内部矛盾的问题·····	(246)
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铁托同志·····	(253)
重视理论 提倡民主 尊重科学 ——回忆少奇同志的几次讲话·····	(256)
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 ——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271)
一、仍然存在着分歧·····	(272)
二、坚持价值规律的内因论·····	(274)
三、价值规律外因论观点实际上是自然经济论·····	(276)
四、价值规律外因论对实际工作的危害之一 ——不讲经济效益·····	(280)
五、价值规律外因论对实际工作的危害之二 ——不讲等价交换·····	(286)
六、价值规律外因论对实际工作的危害之三 ——实际上取消了综合平衡·····	(290)
七、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292)
关于加强统计工作和改革统计体制的问题·····	(296)
关于改革我国统计体制的呼吁·····	(310)

流通概论·····	(312)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无流通论”·····	(315)
二、生产与交换、交换与流通、流通一般、流通 对生产的作用·····	(320)
三、流通领域的劳动、流通费用·····	(325)
四、流通规模、流通时间·····	(328)
五、研究流通过程的目的、研究对象·····	(329)
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	(332)
谈谈搞好综合平衡的几个前提条件·····	(335)
加强统计工作,改革统计体制·····	(344)
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	(351)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 兼论第三次产业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以 及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性质问题·····	(358)
也谈理论联系实际和百家争鸣问题·····	(377)
调整、改革与速度·····	(386)
《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前言·····	(388)
关于中共旅莫支部·····	(389)
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习 ——重读刘少奇《答宋亮同志》·····	(393)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401)
在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上的发言·····	(403)
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兼论按资金量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问题·····	(409)
这两年物价上涨主要原因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409)

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必须首先清除“左”的思想·····	(412)
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还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	(415)
要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就要使基本建设投资归中央和省、直辖市集中掌握·····	(418)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是不可分的吗? ·····	(421)
防止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一个具体建议·····	(424)
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	(427)
提高现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之一——改善经营管理·····	(428)
提高现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之二——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	(430)
一个有争论的老问题——设备更新的年限问题或折旧率问题·····	(433)
低折旧的理论根据是否否定无形磨损·····	(436)
在经济计量学会年会上的书面发言·····	(440)
不是要不要抓速度而是如何抓速度·····	(446)
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450)
我们的经济计划要符合社会需要·····	(454)
也评《天云山传奇》·····	(457)
介绍一本描写地下工作的好小说——欧阳文彬、费三金著《在密密的书林里》·····	(466)
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	(472)

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

我希望能够得到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包括诗词在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其他已译出的著作。如不能一下都给我，则希望在最近先发给以下几部书：

1. 毛泽东：《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中、下三册；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
3.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手稿》；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经过最近一次审讯，我了解到你们对于我屡次请求多发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有疑虑——担心我要利用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甚至翻案。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能为任何反马克思主义、

* 本文是在1972年3月坐冤狱时写的，1984年收入《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反革命的目的利用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历史的无数事例证明，那些想歪曲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来为自己的反革命目的服务的人，最终只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至于翻案之说更拉扯不上。在审讯初期，我对于经济研究所接待×××、×××、×××这批人的经过情形是的确记不清了。然而我知道经济研究所每次接待外宾都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和档案可查，而且经办的人都在。但是对于我在这次接待中所犯错误，现在竟会上“里通外国”和“特务”这条纲，非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当时就不认为是错的），就是现在我也没有想通。

现在我的最大奢望就是想在死以前（这也没有几年了，我已经64岁了）多读些马、恩、列、斯、毛的书。活一天，总要学习一天，改造一天思想。领导上或许认为我这个顽固头脑的改造是没有指望的了，但是我对自己还没有绝望。我还想在死以前对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做一次清理。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意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野心，过去我是没有向你们说的。因为连请求多发给些马、恩、列、斯、毛的书读还不能得到批准，别的就更不用说了。等判决以后再提出吧。但是现在看来，判决是遥遥无期的了。我应该现在就把这个意图向你们报告，我的这个意图或野心就是想经过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的进一步系统深入的学习，在死以前，在监牢里写出一部既是我的自我批判、又是对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揭发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稿，希望能够得到经济学界对我的进一步的帮助，即对我的进一步的批判。

我在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①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也在起着作用。但这是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有完全不同本质的价值规律。我这个标新立异的两种价值规律的说法会引起争论和批判是意料中的，而且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但是一直到1963年前后，这种争论和批判没有超越学术讨论的范围。1958年底毛泽东同志在郑州会议上提出了要尊重价值规律和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问题。接着又在中央文件的批语中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我反复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意见，觉得我关于价值问题的提法在总的方向上（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尊重价值规律），还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意见的。可是当我正在这样自我安慰的时候，对我的批判却一步一步升级了。

大概在1959年或1960年，毛泽东同志对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问题提得更尖锐了。他批评了商业部压价收购农副产品的政策。在此以前，我们在经济研究所讨论价值规律问题时是很学院式的，就是不与价格问题挂钩的。因为当时中宣部有人对此曾有严厉交代：价格问题是政策问题，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党的政策是学习和执行的问题，是不能讨论的。因为他这交代是在经济研究所的党的领导小组会上作为中宣部的正式命令提出的，所以我虽然很不同意，然而还是执行了。但是在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商业部之后，大约在1960年或1961年，那时已成

① 指《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载《经济研究》，1956（6）。

立了全国物价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一些研究物价问题的同志也参加了物价委员会的工作，一位代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来对我们实行挂钩领导的同志要我约几个对物价问题有研究的人座谈一下等价交换问题（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问题）。我倒很高兴，我想他大概是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意见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来听取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的意见的（我知道他是一向很讨厌我关于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等意见的）。可是这位同志在座谈会上先是否定当时存在工农业产品的差价。他说，经过解放以后物价调整，这种差价缩小或不存在了。可是接着他又说实行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就要减少财政收入，就是不要积累，你们这些靠财政拨款开支的文教机关和所有行政机关的人都要饿饭。因为参加座谈会的人比较多，而毛泽东同志有关等价交换的意见并未公开发表，我不能引证这些意见来驳他。因此，我问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意见如何体会。他说，毛泽东同志说的等价交换是指等价格交换，我们商业部门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做的。他又说马克思说的等价交换也是指的等价格交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价值是多少根本无法知道，商品是按价格互相交换的。

这不仅是诡辩，而且完全违背了政治经济学关于等价交换的起码常识，也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要实行等价交换的严重歪曲。因为如果等价交换是指等价格交换，那么不论价格如何涨落，如何背离价值，都是等价交换，因而再提等价交换就等于是无的放矢或无病呻吟了。例如：甲乙两产品，价值各为0.10元，那么1个甲产品换1个乙产品固然是等价交换，明天把甲产品价格升为0.20元，乙产品价格不动，变成一个甲产品换2个乙产品，还是等价交换。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

会按价格进行的商品交换称作等价交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自由竞争，价格不断涨落，今天价格高于价值，明天就会跌到低于价值，两相抵消的结果，还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起着调节社会生产的作用。因此，列宁说，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不实现来实现的。

难道这位同志不懂得这点起码的经济学常识吗？不是的。他是为了替主观主义的价格政策辩护，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违抗毛泽东同志关于等价交换的意见，是歪曲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并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价值规律偷换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即市场自发势力的价值规律。

不久前《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最初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后来则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开方便之门（原话记不得，大意如此）。这个意见非常对。否认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的人，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碰了钉子之后，必然会转而向盲目的资本主义商品价值规律屈服。因为他们只认得后一个价值规律。

到1964年，曾经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专门批判我的经济学思想。会上，财贸办公室的那位同志又宣扬了他的攻击等价交换的假理由，如说实行等价交换要影响财政收入，出现赤字预算，引起物价和生活费用轮番上涨，等等。他还歪曲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等价交换和价值规律是在三年经济困难背景下针对下面刮的“共产风”而说的，后来他也没有再提了；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一语也是针对社员群众和基层干部而说的，不是对高级干部而说的。这简直是狂妄透顶：他把毛泽东同志提得那么高的一条经济规律说成是一时权宜之计，而居然宣称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必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意见的。至于他说“毛主席

后来也没有再提等价交换了”这句话背后是大有文章的。关于这点，我留在下面说。

1965年，派驻经济研究所的“四清”工作队领导小组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二千人的大会上作了关于经济研究所“四清”工作总结报告，其中也有一段攻击等价交换的话：“大家都知道价值规律只是通过价格对价值的背离才起作用，而孙冶方却提倡什么价格与价值相符合的价值规律。这是天下最荒唐透顶的奇谈怪论。”（文字可能有出入，意思保证不错，可以查对记录）这种观点同上述那个人主张等价（格）交换，而反对等价（值）交换的荒唐的观点同出一辙。

全国解放不久，毛泽东同志对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就提出了意见。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且特别强调了中央和地方这两条腿的问题，主张发挥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发挥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这个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也就是一般称作财经管理体制的问题，其中包括计划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工业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等等。当时，我还在国家统计局工作，一年总有好几次听到上级领导人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个体制问题的指示，所以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使我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体会到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可是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却发现很多研究人员甚至不知道什么叫体制问题。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人把诸如体制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例如班组之间和工序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即马克思在有关协

作和工场手工业那一章以很大篇幅去进行研究的问题)，等等，都称作“生产力组织学”。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不是生产关系问题，从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们认为热衷于研究这一类问题是从业务部门带来的“业务挂帅”倾向和“生产力论”倾向。我不同意他们这种意见。因此，我到经济研究所不久，就为制订研究规划问题，好几次同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我在这里着重说一下体制问题的内容。先说问题的矛盾表现在哪里。

从中央一级的角度来看体制问题，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每年两个会议上的“争”——全国计划会议上的争投资和全国物资分配会议上的争物资。由于这两个“争”，国家计委的年度计划方案，迟迟不能提出，于是理应前一年年终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会期越拖越迟，到当年下半年才召开，而且开过之后，许多部门和单位的计划仍不能定案。年度计划到年终才下达，成马后炮。由于地方各级、各企业都要争物资，于是全国物资会议规模越开越大（万人以上），被称作“骡马大会”，时间越开越长。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体制问题，矛盾表现为两点：一是由于计划下达迟，使计划由促生产的动力，变成扯生产的后腿；二是由于体制不合理，把群众的积极性限制得死死的，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费，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要说明后一点必须介绍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原封不动地搬来的一套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因为它是代表那条少慢差费路线的整个财经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企业、物资等等管理体制）的最集中的表现。这套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的要点可简单归纳如下：

1. 固定资产无偿使用制——企业利润上缴任务根据生产指标确定，与固定资产的实物量或资金量不发生联系。增加非

定额流动资金还要负担银行利息，而增加固定资产是连利息也不要负担的。这是鼓励争投资的。

2. 固定资产折旧率非常低（只算实物的有形磨损，不计算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经济价值的下降）。因此计入产品成本中的折旧费微乎其微，而多要到设备，备而不用，对企业来说就是自己有，自己方便，这就造成设备的浪费，利用率低。

3. 固定资产折旧作为财政收入上缴财政部门。企业设备和建筑物的更新，作为新的投资，由企业向财政部门申请，并作为新的基建项目处理。即按惯例，对老企业的设备更新的投资总是抓得很紧，不容易批准。

以上三条是明显的矛盾，一方面鼓励争投资，鼓励设备和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对花钱少收效快的设备更新，亦即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费用，却是卡得死死的。然而这个管理制度中最不合理、最落后的是下面第四条：

4. 财政部门按规定比例从折旧基金中拨给企业一定款项作为固定资产的日常维修和大修理费用；但附有严格规定，大修理不准增殖变形（即不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如要增殖变形，就要由企业作为新的基建投资，向上级打报告，请求审批，而这是很难批准的。因此，本应成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最好机会的大修理，就成了“古董复制”。

压制广大群众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积极性，也就是压制了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革命因素，把技术，从而把生产力冻结在建厂初期的水平上——这就是从苏联搬来的这套固定资产管理体制最落后的本质。

这套体制虽在1958年及以后几年中，曾经经过一些修补，但基本上没有动，因此，当这套落后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仍然

束缚着企业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下部的手脚的时候，固定资产管理制度问题——这个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完全是一个事务性、技术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不合理的财经管理体制的集中表现，是少慢差费路线的物质化身。所以，中央和省、直辖市地方领导人以至企业的干部和群众对改革财经管理体制的意见，逐渐地都集中到固定资产折旧费问题上来。大家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三种：（1）折旧费上缴财政部，维持原制度，另外做一些不伤害这套原制度基本精神的修补工作。（2）留在省、直辖市地方统一分配。（3）留在企业。我赞成第三种意见，认为第二种意见最不好；因为这既不能发挥企业群众的技术革命、技术改造的积极性，也不如中央统一分配能照顾全局。

大概在1960年下半年或1961年上半年，李富春副总理在上海市计委提出的主张折旧费由省、直辖市统一分配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让我和别的几个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对折旧费处理问题提出一个意见，我就把我上面的意见告诉了他，并说我正在就这问题做调查研究，以后我再向他提出较详细的报告。

1961年八九月间，我在北戴河列席全国计划会议，在洗海水澡时遇见李先念副总理，他问我：折旧费能不能算财政收入。我说，折旧是固定资产价值转移到产品中的部分，是老本，不能算财政收入。他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用文章。我说这个问题能在刊物上公开讨论吗？他说，有什么不可以呀！我说，那么我写了文章请你看看。这一年，我在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工业会议的小组会上都陈述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提出这个“折旧是老本，把折旧当财政收入上缴是吃老本”的论点（并从这论点出发进一步论证了“吃老本”会损害老企业、老工业基地的生产力的理由），动摇了旧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的理论基